

职业社会学视角下我国院校研究专业化的 现状、框架与路径^①

魏署光¹,雷宁^{1,2}

(1.华中科技大学,湖北武汉430074;2.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401331)

摘要:院校研究旨在通过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为高校决策提供支持。院校研究的专业化水平决定了院校研究决策支持功能的有效性。当前我国院校研究机构的定位不明确,院校研究工作呈现理论驱动强于实践驱动,院校研究人员的研究规范性有待加强。从职业社会学视角看,院校研究专业化旨在建立院校研究的专业知识体系,确立院校研究的内部边界构成,促进生态系统之间的递归循环。为了促进院校研究发展及其职能发挥,需要通过设立院校研究机构、界定组织角色、提炼抽象知识、提升合法性四个阶段构建院校研究的专业化路径。

关键词:院校研究;专业化;知识体系;边界构成;递归循环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23)01-0031-09

DOI:10.16697/j.1674-5485.2023.01.004

院校研究在高校内部治理和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学界对院校研究有多种界定。乔·索普(Joe L.Saupe)提出,有别于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关注具有普适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和知识,院校研究是“在高等教育机构内进行的研究,旨在为院校规划、政策制定和决策执行提供信息”^[1]。刘献君等将院校研究定义为通过对本校管理问题开展系统和科学的研究,以提高本校管理水平的一种研究^[2]。赵炬明指出,院校研究的特征包括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和为学校管理决策提供支

持^[3]。从以上学者对于院校研究概念界定可以将院校研究的特征归纳为:第一,院校研究是对于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第二,院校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科学分析数据为学校决策提供支持;第三,院校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知识和技术的专业。《院校研究新方向》前主编弗雷德里克斯·沃克文(J.Fredericks Volkwein)指出,专业身份的模糊性是院校研究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4]。院校研究的专业化水平决定了院校研究决策支持功能的有效性。就专业化而言,职业社会学对专

收稿日期:2022-11-28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普及化时代我国高校决策支持研究:基于院校研究的立场”(BIA220089);2020年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061S)。

作者简介:魏署光,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雷宁,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业化有着长久而深入的研究。从职业社会学视角审视我国院校研究发展现状,探索构建院校研究专业化框架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院校研究发展的现状审视

理想的职业包括三个元素:一群特定的人,一种特定的工作类型以及一个有组织的机构^[5]。我国院校研究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一)不同高校对于院校研究机构的定位不明确

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于2014年开展了一项对于全国878所本科院校高教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设立高教研究机构的学校有514所,共有专兼职研究人员4578名,这支队伍中专职与兼职人员比例相当;大部分高教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院校研究,研究任务包括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校本研究或者两种研究兼顾^[6]。我国院校研究正处于探索起步过程中。高校在院校研究机构设置时存在定位不明确的问题,如部分高校对于院校研究机构的定位是学术化发展,虽然为学校教育改革服务,但更多开展理论研究;部分高校将院校研究机构挂靠教务处,工作重心放在教学和人才培养;部分高校因学术积累丰富演变为学校直属机构如发展规划处等^[7]。

(二)院校研究工作呈现出理论驱动强于实践驱动

刘献君指出,我国院校研究和美国院校研究经历了两条不同的路径^[8]。美国的院校研究是从实践开始,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发展出理论研究。由于美国的认证协会大多要求高校设立院校研究机构,因此美国的院校研究拥有一支相对成熟的队伍,有固定的研究机构、职业发展与培训体系、规章制度和出版刊物等^[9]。美国还通过建立美国大学数据交流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Data Exchange, AAUDE)、高等教育数据共享协会(Higher Education Data Sharing Consortium,

HEDS)进行数据共享,为院校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研究显示,近年来美国院校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职责从承担一般行政职能和数据报告任务转变为负责评估、认证、战略规划等全校范围内事务。^[10]美国院校研究人员通过实证研究,总结规律、发展理论。我国则是在探索高等教育基本问题理论研究过程中产生了院校研究。高等学校领导者们探索如何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解决高校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11],针对高校管理中的不同事务,服务于高校决策^[12]。院校研究专业实践包括参与学校规划制定^[13]、通过学情调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4]等形式。

(三)院校研究人员的研究规范性有待加强

雷洪德等人基于2015—2019年中国院校研究年会参会人员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院校研究队伍初具规模,但是人员流动性较大且专业化程度不高^[15]。有研究者认为,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制约着我国院校研究队伍的发展^[16]。我国的院校研究经历了从“院校研究的研究”到“院校研究”的过程。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开展院校研究可以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案例研究为基本研究方法。^[17]以近5年为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2018—2022年的年会主题依次为:大数据时代的院校研究与个性化教育(2018年)、院校研究规范发展与院校研究专业人才培养(2019年)、高等教育普及化与高校人才培养(2020年)、院校研究与教育评价(2021年)、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与评价(2022年),院校研究人员通过对中国高校管理问题开展专题式研究,推进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但是院校研究的规范性依然不够,如一些研究主要介绍院校的成功经验,没有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一些研究在采用案例研究的时候,没有严格遵循案例研究的规范化步骤。案例研究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其影响力在于将传统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从而构建理论。好的案例研究需要遵循严格的方法,并且扎根于可信证据的理论^[18]。

综上所述,我国院校研究专业化队伍正在逐渐形成,院校研究议题开始逐渐从宏观走向微观,

转向基于数字与数据的实证研究,进而促进本校管理实践^[19]。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无论是院校研究机构定位、发展方向,还是实证研究的规范性都需要从根本上反思院校研究的专业化问题,明晰院校研究专业化发展路径。

二、职业社会学视角下院校研究专业化内涵

(一)职业社会学视角下专业化的内涵

职业社会学关注一个职业尝试如何成为一个专业的重要问题。专业化是专业人员在工作系统中集体行动的结果^[20],是知识和技能的垄断,也是涂尔干所指出的社会分工里实现有机团结的重要形式。专业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专业通过与外界的互动获取专业地位与管辖权的动态过程^[21]。专业是一个正式的职业,拥有深奥的知识和技能,以向他人提供高质量服务为特征^[22]。专业与一般职业的区别在于每一个专业都有一个科学的知识体系^[23]。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专业化界定为:一个拥有科学的知识体系的专业通过与外界的互动获取专业地位与管辖权的动态过程。专业化发展面临的生态不仅是来自相近职业的管辖权的竞争,而且还包括国家生态的认可^[24]。因此,将院校研究的专业化发展放置于“联系的生态系统”^[25]中进行分析更为合理。

从职业社会学视角来看,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过程理论和结构理论。专业化的各种结构性组成为专业化提供了结构性的锚定;同时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又会导致专业化进程的前进或者后退。分析院校研究的专业化发展,需要结合时空的动态性对于专业化的结构进行考察。一是对专业化的动态过程进行分析。既有研究通常将职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假定为一组固定

的环境,然而无论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的那样,互动的真相并不是在互动的两者之间,而是存在于三者,即两者和社会空间三者的互动中^[26],还是芝加哥社会学派一直被批评不愿意研究外部环境变化的问题,都意在指向一个事实——职业需要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环境。为此,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提出“联系的生态系统”^[27]的概念,指出外部生态的变化,以铰链的形式对关联生态起作用。本研究以此为逻辑起点,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上对专业化的动态进行分析。二是对专业化的结构性进行分析。专业的特征之一是具有科学的知识体系,特征之二是一个正式的职业。刘思达根据“联系的生态系统”^[28]概念,提出了一个操作化的框架,即联系的生态系统运作具有两个核心机制,即生态系统内部的边界构成与生态系统之间的递归循环过程。^[29]

(二)院校研究专业化的基本维度

在职业社会学界定的范畴里,社会空间的拓扑结构是在交互过程中关联定义的。高校生态系统由于受到学术和行政双重制度造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影响,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拓扑结构,院校研究在专业资源争夺上缺乏像律师、医生等职业的强烈排他性。简而言之,院校研究在专业化上面临更为复杂的“联系的生态系统”。我们在分析院校研究专业化时,不能孤立分析院校研究这一独立个体,而是需要将院校研究置于其所面对的整体高校生态系统之中,甚至更大的国家层面的生态。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分析院校研究专业化的三个维度,即院校研究专业知识体系、院校研究内部边界构成和生态系统之间的递归循环。(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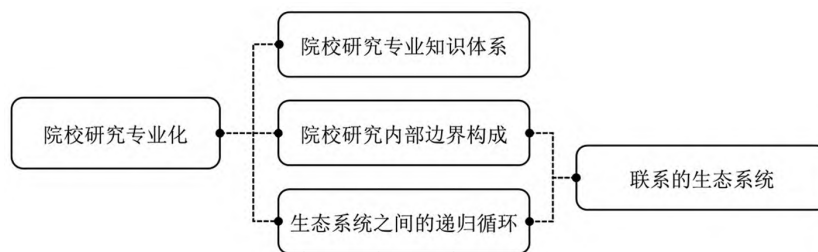


图1 院校研究专业化的基本维度

第一,院校研究专业知识体系。专业知识既不是纯粹的学术知识,也不是情境的工作经验,而是两者的结合。从大学或者专业学校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只有在工作场所积累经验后才转化为专业知识。学术知识通常体现为抽象知识组合的形式,因此其主要价值在于符号方面,即澄清专业知识体系的严密性、明晰性和逻辑性,从而在认知层面使专业明确管辖权,并且上升到价值层面并获得执业的合法性。但是面对联系的生态系统,是否认可管辖权和合法性,受内部边界构成和生态系统之间的递归循环影响。

第二,院校研究内部边界构成。安德鲁·阿伯特将边界定义为差异点,当局部随机的差异点沿着某些单一的差异轴排列成扩展的对立点时,就形成了原始的边界^[30]。在这些差异点中,象征性或客观化的区别形式被构建和表现出来。对于专业而言,边界是两个或多个专业或非专业行为者寻求对类似工作建立管辖权的冲突与合作的场所。专业人员构建边界的过程,同时也是参与社会空间构建的过程。构建边界的过程包括三种类型的边界工作,分别是边界制定、边界模糊以及主动或者被动的边界维护。^[31]边界制定是指专业通过划界,在社会空间中为本专业划出管辖区域;安德鲁·阿伯特提出,当边界过于清晰时,会成为管辖权的薄弱环节^[32]。因此,专业人员会寻求与其他专业的相似性,使边界变得模糊且富有弹性,此过程为边界模糊。模糊的边界是产生和竞争专业知识的主要场所。与边界制定或者边界模糊不同,边界维护不是专业人员自身的行动,通常由第三方如国家监管机构、服务对象等参与行动。以我国为例,政府机构在边界维护上发挥着主要作用。职业构建边界的过程中也就是确立管辖权的过程。

第三,院校研究内外部系统的“递归循环”。“递归循环”源于法律学中对于法律从立法到实施循环性变革的动态过程。^[33]国家通过创设各种机构和制度对于职业的管辖权进行界定,但由于各个相关的主体对于管辖权有不同的观点,故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管辖权的冲突。这些存在冲突的

实施过程引发对于管辖权的调整和控制,直至下一次冲突的出现。专业管辖权变化的动态过程也体现了递归循环这一互动特点。以院校研究的专业化为例,院校研究在高校生态系统内部的边界构成体现在空间这个维度上,递归循环过程则体现在时间的维度上。

三、我国院校研究专业化框架的构建

基于院校研究专业化的三个基本维度,即院校研究专业知识体系、内部边界构成及生态系统之间的递归循环,厘清我国院校研究专业化框架,这既有助于院校研究为高校管理决策提供支持,也对院校研究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院校研究知识体系

专业的知识体系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学术性的抽象知识和职业性的具体实践知识。美国院校研究会专业发展委员会在2008年制定的院校研究知识矩阵,将其划分为七个部分,包括学校效能、问责及评估,学生问题,教师问题,预算/财务及学校设施,人际沟通、团队合作、领导与职业发展,技术,分析。^[34]帕特里克·特伦兹尼(Patrick T. Terenzini)提出院校研究包含三个层次的组织智能:第一层是技术和分析智能,第二层是问题智能,第三层是情境智能。^[35]每个层次又包含特定的学术性知识和职业性知识。技术和分析智能要求了解数据结构,要求了解变量名称、定义和编码,要求了解研究设计、抽样、统计、测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等技能,要求掌握院校数据文件的创建和维护。问题智能要求了解学生、教师、财务和设施等领域管理;要求掌握院校规划、预算制定与设施规划方面的“规划”知识,掌握资源分配和设施维护方面的“运行”知识,掌握教师工作量分析、院校评估等方面的“评估”知识;要求理解决策的基本特征,院校运作的方式,以及院校如何做出决策。情境智能要求了解高等教育的历史与文化,了解所在院校文化(如正式和非正式校园政治结构,治理与决策过程),理解校园组织情境(如关键参与者的价值观和态度),理解院校环境(如院校所在区域、国家和国际环境)。

以上研究对于院校研究专业知识体系的阐释虽然视角不同,但是构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综合已有成果,我们可以尝试总结院校研究专业知识体系。(见表1)

表1 院校研究专业知识体系

知识的基本维度	知识的具体内容
学术性知识	数据结构,变量名称、定义和编码
	研究设计、抽样、统计、测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等
	学生、教师、财务和设施等领域的管理
	高等教育的历史与文化
职业性知识	院校数据文件的创建和维护
	院校规划、预算制定与设施规划方面的“规划”知识,资源分配和设施维护方面的“运行”知识,教师工作量分析、院校评估等方面的“评估”知识
	决策的基本特征、院校运作的方式以及院校如何做出决策
	所在院校文化(如正式和非正式校园政治结构、治理与决策过程)、院校校园组织情境(如关键参与者的价值观和态度)、院校环境(如院校所在区域、国家和国际环境)

专业知识的社会建构,需要从专业人员的工作场所开始。^[36]院校研究人员从学校或者专业培训机构接受关于学术性知识的学习,学校基本数据、研究方法、校园历史、组织文化等学术性知识以系统化、结构化、合法化和传承化的方式进行传授。学术性知识的主要意义在于澄清工作基础和文化价值,使院校研究工作合法化。但是,学术性知识通常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分散状态,不能直接运用于院校研究的工作实践。准院校研究人员在踏入工作岗位后会面对情境性工作任务,如在资源分配、制定院校规划等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会促进他们的学术性知识转化为职业性知识。此外,由于院校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对本校管理问题提供决策支持,特定院校的政治结构、治理和决策过程、管理者的价值观和态度等是院校研究知识体系的最高层级。因此,院校研究专业知识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体现为相互补充、相互递进的关系。院校研究专业化不仅需要院校研究人员在学校或者专业机构接受学术性知识的学习,还需要在相应院校研究岗位上习得职业性知识。学术性知识和职业性知识共同构筑了院校研究的专业知识体系。

我国院校研究尚未发展成为一个专业方向。华中科技大学正在尝试将院校研究设立为二级学科/专业,部分高校如厦门大学开设了院校研究课

程,但是单一课程的设置无法将知识以系统化和结构化的方式传授,学术性知识作为职业性知识的前置知识,如果这一阶段知识没有建立体系,会影响学术性知识到职业性知识的转化。此外,国内院校研究人员通常非科班出身,而是由于岗位轮换进入院校研究机构,他们在前期其他岗位工作的过程中掌握了部分院校研究的职业性知识,但是缺乏系统性的学术性知识。

(二) 确立院校研究的内部边界构成

院校研究的内部边界构成是院校研究人员通过边界制定、边界模糊以及主动或者被动的边界维护在空间上确立管辖权的过程。边界制定和边界模糊通常是同时存在的^[37]。院校研究人员试图将自己与其他职业区分开来,以构建自己的群体身份,使职业身份合法化。有研究指出,院校研究的功能是为学校提供咨询、提供决策支持,并不是代替决策者做决策^[38],其实质就是划界,试图通过这一划界将院校研究与管理进行区分,以明确院校研究的边界是提供决策支持。系统的内、外部力量会通过触发扰动因素,使职业的管辖权加强或者削弱。其中,外部力量所导致的管辖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更大。如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就对院校研究管辖权产生较大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台式计算机的普及,使高校内部生态中的其他机构如规划办公室、招生办公室、预

算办公室、各学院办公室、学生事务办公室等都开始运用数据对院校开展研究^[39]。这些变化使院校研究人员和高校其他内部机构人员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产生交叉。

专业在进行边界维护的时候,有时候是以主动的形式调整边界,但更多时候是以被动形式由国家或者服务对象来进行边界维护。在分析院校研究管辖权的时候,需要先分析提出院校研究管辖权的场所^[40],即高校。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高校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使院校研究专业化成为可能。内部提升和外部问责等压力给院校研究人员带来了各种挑战,也同时需要院校研究人员扮演多种角色。还有研究提出四种院校研究的类型,指向院校研究的四个目的和角色,这四个方面的角色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在任务与任务的切换之中,也存在着角色的切换,具体取决于任务和受众的复杂性。(见表2)

表2 院校研究的四种目的和角色^[41]

组织角色和文化	目的和受众	
	形成性和内部提升	总结性和外部问责
行政和制度	描述院校—信息权威	呈现最佳案例—公关专家
学术和专业	分析改革—政策分析师	提供公正的有效性的数据—学者和研究人员

也有学者提出在中小型高校中由于学校规模原因,院校研究人员会接触相对而言范围更为广泛的任務,这些学校的院校研究机构呈现出扁平化的结构,院校研究发展可划分为数据支持/分析、数据分析/解释、数据咨询、数据负责人四个阶段。^[42]

无论是院校研究人员四种角色所构成的矩阵,抑或是中小型高校中院校人员承担的四个阶段任务,都是院校研究专业定界的过程。在面对不同的组织角色和文化、应对不同的目的和受众时,院校研究的内部边界也相应进行切换。院校研究的边界维护更多是以被动形式即由服务高校所决定,当面对偏重行政和制度组织文化的高校,需要实现内部提升的目标时,院校研究的管辖权主要体现为作为信息权威,描述学校各类信息;当

偏重行政和制度组织文化的高校,需要实现外部问责的目标时,院校研究的管辖权体现为作为公关专家,呈现最佳案例;当面对偏重学术和专业的高校,需要实现内部提升的目标时,院校研究的管辖权就转变为作为政策分析师,与学校管理层合作,为学校变革提供支持;当面对偏重学术和专业的高校,需要实现外部问责的目标时,院校研究的管辖权则是作为学者和研究人员,调查并提供证据,判断制度的有效性和目标的实现情况。因此,院校研究的内部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受众和任务的性质变化而变化,甚至由于同时承担多重角色而出现合界。

结合我国院校研究的现状来看,由于越来越多高校没有建立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存在职能部门成为决策主体的现象^[43]。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调查信息、收集数据提供决策支持的过程中导致了与院校研究边界的冲突。同时,院校研究在边界维护时受外部主体即国家和高校的影响较大。当国家赋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高校重视决策支持时,院校研究主要定界于提供公正有效的数据和为学校变革提供支持;当国家赋予的办学自主权相对较少,高校不重视决策支持时,院校研究定界范围会被限制在收集数据和呈现最佳案例。这两种边界的差异既与高校类型有关,同时也会受高校组织角色和文化影响。院校研究的专业化与高校生态紧密关联。拥有较多办学自主权、更重视科学决策支持的高校,会更快更好推动院校研究的专业化发展。

(三)促进院校研究内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的递归循环

当前,高校面对的外部环境是一个不确定的、动荡的环境,一般大学采取权变的视角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美国院校研究的动因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如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等,高校为了回应外部需求开始设立院校研究机构^[44],随后高校领导、职能部门在数据、政策与理论方面寻求支持的需要,成为驱动美国院校研究发展的主要因素。欧洲的院校研究则是在中央集权式的高等教育体制下由政府推动展

开的^[45]。

我国早期院校研究是在借鉴美国院校研究经验的基础上起步并且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和目标等皆有不尽相似之处,因此我国院校研究专业化发展上呈现出本土化的递归循环过程。2007年创设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院校研究的开展,但政府能否制定与之相对应的配套制度,如高校决策制度和院校研究准入、考核、晋升制度,是决定其职能能否实现的关键。部分高校领导认为高校发展需要院校研究的支持,重视院校研究,这部分高校的院校研究人员的管辖权可以得到顺利推进。反之,就会限制院校研究人员的管辖权。

总体来看,我国院校研究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即部分高校管理者认识到院校研究在高校决策中的重要性,开始重视院校研究,在本校范围内

完善院校研究配套制度,其他高校受此影响开始完善决策体系,建立健全院校研究机构和制度。此外,院校研究专业化的三个维度并不是以结构化形式存在的,专业知识体系在价值层面证明院校研究工作的合法性并使院校研究人员获得开展工作的能力;内部边界构成使院校研究人员在社会空间上明确身份,获得管辖权;生态系统之间的递归循环则帮助我们在时间的维度上了解院校研究的管辖权变化过程。

四、我国院校研究专业化的发展路径

结合安德鲁·阿伯特提出的扰动因素是职业系统的核心问题^[46],以及院校研究发展的实际,本研究尝试将院校研究的扰动因素概括为外部需求、内部需求、边界制定和价值变迁四个来源。以扰动因素为引线,可以归纳出院校研究专业化发展路径。(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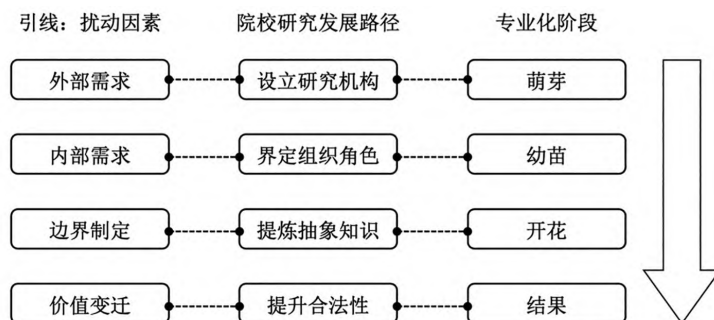


图2 院校研究专业化发展路径

(一)萌芽阶段:应对外部需求

在萌芽阶段,高校为了回应外部需求如招生规模的扩大、外部问责等,设立院校研究机构,催生了院校研究专业化的出现。外部需求为院校研究开创了业务领域。院校研究人员成为完成这些业务的主体。业务在院校研究群体出现之前既已存在,业务是为了回应外部需求而产生的,当业务消失时,群体也会伴随消失。此阶段对于院校研究专业化而言,是以被动形式体现的,主要受外部因素所影响。

(二)幼苗阶段:应对内部需求

在幼苗阶段,院校研究主要受内部因素影响。高校提升内部治理和决策支持等需要,促进了院

校研究专业化的发展。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提炼出院校研究专业知识,如制定规划、资源分配等,可以为高校决策提供支持。在面对不同组织文化时,院校研究人员扮演不同角色,进一步拓展了其在高校决策支持中的边界。除了注重定量数据之外,院校研究人员也开始重视定性信息,在描述、分析的基础上提供公正有效的数据,从而促进院校研究专业化的发展。此阶段院校研究的专业化依旧相对不稳定,受组织文化角色影响较大,当内部需求减弱时,院校研究的管辖权会相应缩减。

(三)开花阶段:边界制定

只有院校研究人员在提炼出抽象知识时,才确立稳固的有效的管辖权。当院校研究发展到在

形式上具有高度抽象性的知识时,类似于植物在生长期分化出花萼、花瓣的原基,进入开花阶段。此阶段具体表现为学术性知识的形式化程度高,具有高度抽象性,同时在实践上却具有普遍价值。由于知识的抽象层次较高,使专业的管辖权具有稳固性,不易被外部力量所攻击;实践上的普遍价值使专业可以有效发挥职能,进一步确立管辖权。当前我国的院校研究发展阶段正处于向确立管辖权阶段的螺旋上升过程,这种迂回曲折既受组织角色定位影响,同时也与院校研究是否提炼出抽象知识有关。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的管辖权是由一小部分人即所谓的精英群体所确立的,为特定的高校和高校管理者提供支持。因此,在这一阶段,院校研究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像律师、医生这样获得大众地位的专业。

(四)结果阶段:价值变迁

院校研究在跨组织边界的过程中,通过知识和技能的发展,巩固管辖权,寻求合法化。同时,专业化发展还需要与价值变迁相适应,对于院校研究而言,不仅要使工作内容合法化,而且要使工作方式合法化。这些合法化在技术层面和服务供给层面对于院校研究提出了要求:技术层面要求院校研究人员接受关于院校研究专业知识层面的正式训练,服务供给层面则对院校研究人员的效率和理性化提出要求。未来的院校研究不仅为高校决策提供信息支持,而且还将参与到管理和引导学校变革的过程之中。建立矩阵网络模型,将数据收集、商业智能、质量保证和其他数据相关技能专家嵌入到各个团队中,允许跨组织边界共享人才,从而确保院校研究可以应对高校现实管理需求辅助做出快速有效的决策。为使院校研究能够提供公正有效的数据、高效的决策支持,需塑造科学化和理性化的院校研究价值体系,进而促进院校研究的合法化。当院校研究能够直接提升高校治理水平时,就抵达了统一序列的终点,即迈向专业化路径的结果阶段。

参考文献:

[1] SAUPE J L. The functions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2nd edition) [M]. Tallahassee: Association for Insti-

tutional Research, 1990: 1-22.

[2] 刘献君,赵炬明,陈敏. 加强院校研究: 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J]. 高等教育研究, 2002, 23(02): 54-58.

[3] 赵炬明. 管理咨询与院校研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7(02): 53-62.

[4] FREDERICKS VOLKWEIN J. The diversity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structures and tasks [J].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1990(66): 7-26.

[5] [30] ABBOTT A. Things of boundaries [J]. Social Research, 1995, 62(04): 857-882.

[6] 刘献君,余东升,陈敏,等. 高教研究转型迫在眉睫[N]. 光明日报, 2016-03-17(15).

[7] 刘怡.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组织转型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7: 52-54.

[8] 刘献君. 论院校研究中的若干关系[J]. 高等教育研究, 2009(02): 42-48.

[9] [11] [19] 张俊超. 中国院校研究规范发展的实践转向与路径选择[J]. 高等教育研究, 2013(02): 35-42.

[10] [42] BROWN N J, HEWITT G J, LIN W F, et al.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professionals i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institutions [J].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2017(173): 89-96.

[12] 魏署光. 中国院校研究理论、知识与方法的构建[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09): 40-44.

[13] 刘献君. 院校研究与大学规划[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5): 49-52.

[14] 魏署光,陈敏. 本科生学习效果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华中科技大学 SSLD 的分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02): 167-173.

[15] 雷洪德,黄敏. 中国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的培养目标及其实现路径[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09): 45-49.

[16] 刘亚敏,王声平. 我国院校研究述评与展望[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8(07): 38-42.

[17] 刘献君. 中国院校研究规范发展的路径[J]. 高校教育管理, 2018(01): 1-6.

[18] 李平,曹仰锋. 案例研究方法: 理论与范例

-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3-35.
- [20][37]LIU S.Boundaries and professions:toward a processual theory of action[J].Journal of Professions and Organization,2018,5(01):45-57.
- [21]林美,张新平.教师专业化进程中国家介入方式的演进:基于职业社会学的视角[J].现代教育管理,2020(10):71-78.
- [22]CARR-SAUNDERS A M,WILSON P A.The profession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33:240-245.
- [23]赵康.专业、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J].社会学研究,2000(05):30-39.
- [24][25][27][28]ABBOTT A.Link ed ecologies: states and universities as environments for professions[J].Sociological Theory,2005,23(03):245-274.
- [26]BOURDIEU P.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5:148-149.
- [29][33]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J].社会学研究,2006(01):197-221.
- [31][36]LIU S.Boundary work and exchange: the formation of a professional service market[J].Symbolic Interaction,2015,38(01):1-21.
- [32][40][46]ABBOTT A.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54-98.
- [34][38]魏署光.美国院校研究决策支持功能探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14,90-92.
- [35]TERENZINI P T.“On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revisited: plus ça change…?[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2013,54(02):137-148.
- [39]RICE G,COUGHLIN M A,HOWARD R.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he first 50 years [M].Tallahasse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2011:26.
- [41]VOLKWEIN J F.The four faces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J].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1999(104):9-19.
- [43]刘献君.决策支持:院校管理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领域[J].高等教育研究,2022,43(07):48-53.
- [44]陈廷柱.高校自主办学是中国院校研究有效开展必备的外部条件[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09):60-64.
- [45]蔡国春,郝霏,胡仁东.院校研究在欧洲的发展特征:兼与美国院校研究比较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02):56-60.

(责任编辑:李作章)

The Current Situation, Framework and Path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hines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from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

WEI Shuguang¹, LEI Ning^{1,2}

(1.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2. Chongqing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College,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The core function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 is to collect data systematically, analyze data scientifically, and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IR deter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cision support function of IR. At 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IR department is not clear, the research work is more driven by theory rather than practice, and IR personnel's research norm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professio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IR aims to establish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of IR, establish the internal boundary structure of IR, and promote the recursive cycle between ecosystem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realization of I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path of IR has been clarified as four stages: starting point, development, establishment of jurisdi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esearch; professionalization; knowledge system; boundaries-making; recursive cycle